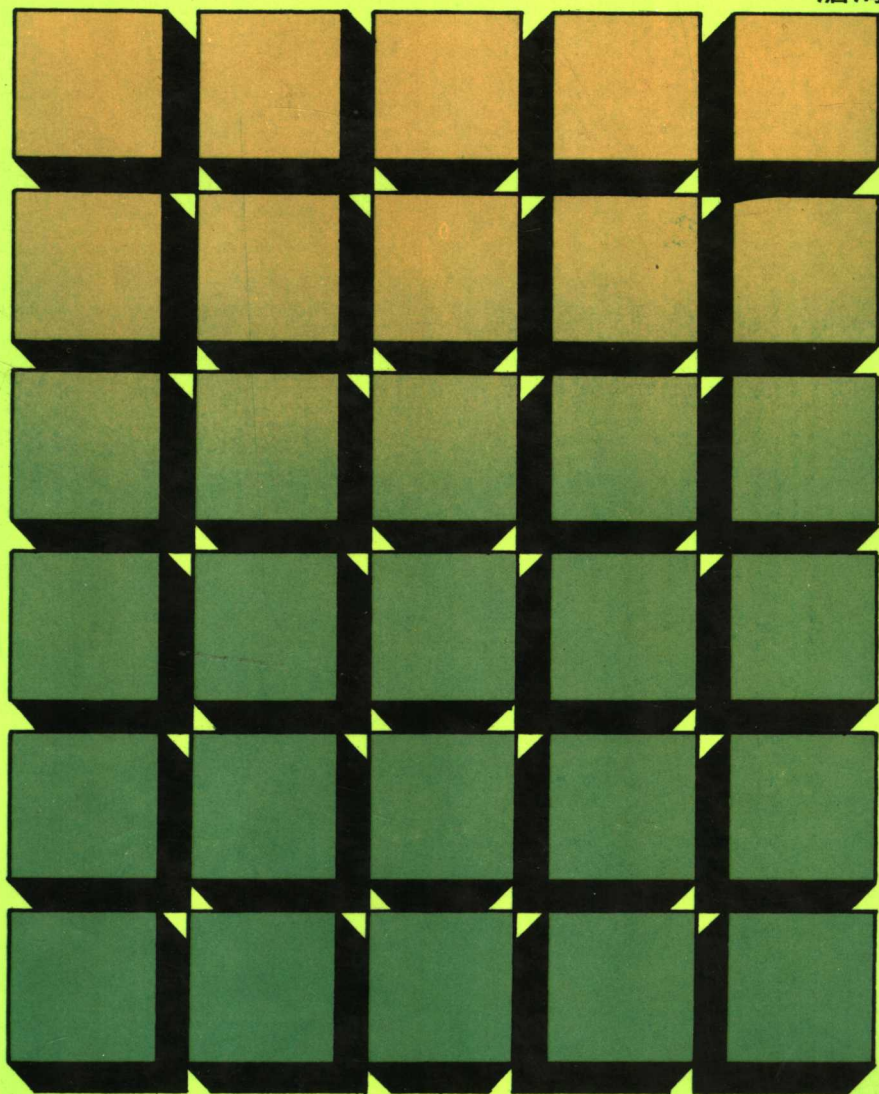


#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



江日新 譯

社會——  
滄海叢刊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

#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

GINO K. PIOVESANA, S.J. 原著  
江 日 新 譯

1 9 8 9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江日新譯 -- 初版 --

台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民78

[5]，221面，21公分

參考書目：面211-218

1. 哲學—日本—現代(1868- ) I. 江日新譯

131.9/8354

©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

原著者 GINO K. PIOVESANA, S.J.

譯者 江日新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編號 E 13003

基本定價 叁元叁角叁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 作者原序

關於出版這本書，我似乎無須多費口舌。事實上一直都缺少一本以西方語言寫作，全面討論過去百多年來日本哲學思想的書。土田杏村 (Tsuchida Kyoson) 的書已經太老舊了，(譯按：指其一九二七年出版那本英文書 *Contemporary Thought of Japan and China* (London)) 並且也絕版了。而高坂正顯 (Kosaka Masaaki) 最近所編那本 (譯按：即 *Japanese Thought in the Meiji Era*, 1958)，則是止於一九一二年的一般思想史。倘若我們將少數一些描述性的文章排除不算，那麼根本就沒有介紹最近日本哲學的合適著作。

有一點需要澄清的，即這本書是一本概論 (survey)，因此它並不想作為一本日本的哲學觀念史。這樣一個謙虛的副標題並不是由於特別客氣之故，而是事實上我們也別無他法。即使是日文書，自麻生義輝對明治時代前十年 (1868-1880) 的日本哲學發展做了開創性的歷史考察以來，仍一直沒有出現一本標準的著作。很不幸地，在麻生義輝之後，日本雖出版了許多討論日本思想的書，但他一直沒有一個真正的繼承者，其原因部分是由於戰前的作家太過於傾向去解釋日本的「精神」，而戰後的作家則強調社會的——倘若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

因此現在最能夠做的是：對日本思想家做一個概略的導論，而不是去處理一直都缺乏的關於體系或哲學觀念史這種基礎研究。作者的寫作方式不像日本戰後作家所寫那樣以其所討論的思想家在政治觀

念、態度上的「進步」或「反動」來評價，而是儘可能以其思辨性思想的一貫性和價值來評價。

我也要對這本書更根本的缺陷做解釋和辯白。首先，由於我的母語不是英語，因此我的寫作缺乏在討論主題時所必需的流暢和簡潔。其次（並且也是較重要的）是這本概論對所牽涉到的日文材料處理得不够充分。如同每一位日本學學者痛苦感覺到的一樣，日文資料是世界上難以了解和評價的一種文獻。另外，將日文術語及觀念譯成西方語言也有極大的困難。尤有進者，選擇材料及強調點上，我也無法普遍得到一致的支持。在解釋上我只能說，事實上日本哲學涵蓋了世界上所有的潮流，從其最初的哲學發展，以至於最近的哲學家，面對數量這麼龐大的出版品，事實上也沒有人能夠全部精熟。

非日本的讀者可能會感到驚訝，因為本書極少談到佛教及儒家思想。最近的日本哲學思想事實上是如本書所描述那樣，居主導地位的——倘若不是絕對獨占的話——實即是西方形式的哲學思考。

讓人感到厭煩的這些及其他理由，在在都勸誘著我不要闖進更富有學養的學者都不敢蹂躪的領域。但我自一九四九年到日本，以及稍後於慶應大學在務台理作教授門下就學，便深深感到極有需要做一些這樣的研究。專業哲學家及研究日本的學生也有這樣的感受。各位讀者可以自己判斷一下，在沒有更好的著作可以取代下，本書是否有些微用處，以及同我一起期待，在很短的未來能夠很快地得到補充。

於此我要向所有幫助此書完成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謝：務台理作教授對日本哲學潮流的睿見；Sandra Sims 在修改我的英文稿的辛勞；Kawasaki Michiko 小姐之準備日文資料。此外，我還特別要向上智大學同仁中的一些神父道謝，他們分別在各方面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很清楚的，其中的解釋及缺點都是作者自己要負的責任。

Gino K. Piovesana S. J.

於東京上智大學，一九六二，五

謝 辭

除了準備第一版時在序言中所提的諸位外，我還要對宮川透教授表示謝意，由於他將此書譯為日文，因此使得此書能修訂再版問世。我並樂意對 V. H. Viglielmo 教授及 Morimoto Yuriko 小姐的秘書工作表示謝意。

一九六八，三 作者

#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 目次

## 作者原序

- 第一章 早期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和改革主義  
(1862—1885) ..... 1
- 第二章 保守主義和盎格魯—德意志唯心論  
(1886—1900) ..... 23
- 第三章 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和新康德主義  
(1901—1925) ..... 49
- 第四章 西田幾多郎的哲學 (1870—1945) ..... 71
- 第五章 波多野精一、和辻哲郎及田邊元等其  
他具有代表性的哲學家 ..... 101
- 第六章 文化主義及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  
及 1926 年到 1945 年的「世界哲學」 ..... 129

第七章 戰後的哲學潮流 (1945—1962) .....	159
第八章 結論——西方哲學之於東方文化 .....	185
參考書目 .....	211
譯後記 .....	219



# 第一章 早期經驗主義、實證 主義和改革主義 (1862—1885)

## 西方哲學的肇始

西元一八六二年年頭，西周（1829-97）在「蕃書調所」（日本研究西洋書籍的中心）提出日本歷史上第一次講習希臘和歐洲哲學的草案。爲了要將它與中國思想和佛教分別開，西周氏稱西方 Philosophy 爲「希哲學」，「希哲學」是個新字，它可能是西周與其蕃書調所的朋友兼同事津田真道（1829-1903）共同研討所得的結論；津田真道也曾推展早期研究哲學的風氣。而這個新字，則到西元一八七四年西周氏印行其著作《百一新論》之時，才爲人所熟知。

比名詞更重要的（大部分西方哲學術語的日本譯名是西周所創譯的），是他在同時也將新的學問引進了日本。今天，西方意義的哲學已列爲日本許多大學的必須課目，而東方思想則保留爲專攻科目；普通的大一新生必須學習西方哲學概論課程，聽那些精通西方哲學的教授講課，這些教授通常都在外國學習研究。因此，很大一部分學生一知半解的知道康德的範疇、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論題乃至於海德格、沙特的存在主義，可是對佛教哲學和儒家哲學卻沒有什麼認

識。粗略看一下數字龐大的哲學教科書（這是由於日本學生數量龐大），也能證實我們這個看法，即他們只是介紹西洋哲學而已。

然而，這並不即意謂西洋哲學比他們自己的東方傳統，對日本人的心靈，在社會—文化上更具有影響力，因為這一傳統是以其他成千成萬的方式所吸收來的。文化並不是單單的只有哲學而已，至於其他影響東西方人的社會—政治潮流，則很少為純粹理論所決定。至於文化「遲滯」則發生得多，而被察覺得少；至於佛教和儒家思想之宗教和理論在表達方式的言簡意賅；因而，當一個人說他所學的是「哲學」時，事實上，他所指的是西方思考型態的「哲學」，而不是東方「哲學」。西洋思想在西元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日本第二次開放後變得非常重要。

本研究以篇幅關係，對所謂「切支丹」或稱日本基督教世紀只能做很簡要的查考。切支丹是在西元一五四九年，當第一個天主教士抵達日本時開始，而到西元一六一四年，將對外國宗教的敵對態度變成官方的正式政策為止。西元一五九九年耶穌會的天草出版機構，刊行了 Fray Louis de Granada 的一本書，這本書有部分理論是基於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後來 Pedro Gomez 的 *Breve Compendium*（《大略》或《綱要》）則討論亞里斯多德《靈魂論》一書，這本書區別了 *Intellectus agens* 和 *Intellectus possibilis*（主動理智，被動理智）兩個觀念，多瑪斯的兩部《大全》和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也被天主教士拿到神學院研習。然由於對基督徒的迫害，和厲行閉關政策，德川將軍實際上滅絕了任何外國宗教和哲學思想的影響<sup>①</sup>。

① 關於 Fray Louis de Granada 見 J. Lopez Gay S. J., *La Primera Biblioteca de los Jesuitas*, in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XV, n. 3-4, 1959-60, p. 159. 關於 Pedro Gomez 見 J. Schütte S. J.,

像新井白石 (1657-1725)、平田篤胤 (1776-1843) 這樣的學者，他們的思想常被認為曾受過西方思想的影響。然而這個影響並沒有把儒家或神道教與西方型態的哲學拉近；在最近一版日本思想資料書中，日本西洋哲學的前驅是：安藤昌益 (大約西元 1700 年)、皆川淇園 (1734-1807) 和三浦梅園 (1723-1789)。貝原益軒 (1630-1714) 也能列入，因為他的《大疑錄》，表現出一種批判而理性主義的思想型態。

這些人中最值得重視的是三浦梅園，這是由於他完成了一套理論體系之故；他的理論與同時代的 Adam Smith 相似，討論「價原」（價格原論），甚至建立了一種類似 Gresham 壞貨幣循環論的法則。

三浦梅園的哲學觀念具見於三書，最有形上學意味的是「玄語」，他修改這本書曾達三十次之多，他又基於他的《條理》說明他的《修理學》，三浦梅園的邏輯形式實在是一種實在辯證論 (a version of dialectic of reality)，並且強烈的滲入了實證的和理性的精神，而不斤斤拘守於權威或傳統<sup>②</sup>。

三浦梅園的實證精神，無疑的是受到荷蘭文作品的影響及「蘭學」的薰陶，所謂的「蘭學」，在內容上含有解剖學、醫學、天文學、地理學和大砲射擊、堡壘防禦的兵學。德川時期儘管採取閉關政策，但仍允許少數荷蘭商人留在出島，出島是長崎的一個獨立部分，吉宗將軍在西元一七二〇年的佈令，部分地允許自由翻譯、研究「蘭學」，其他更具思想性的書籍 (ideological books) 不是荷蘭商人私

(續) Drei Unterrichtsbücher für Japanische Jesuitenprediger aus dem XVI. Jahrhundert, in *Archivum Historicum S. J.*, vol. VIII, 1939, pp. 223-56.

② 長谷川如是閑、清水幾太郎、三枝博音編：《日本哲學思想全書》一、哲學篇，平凡社，1957。

自携入日本，就是來自於中國。

這些禁書的影響極容易看出來，例如高野長英的《聞見漫錄》，裏頭有一篇從泰利斯（Thales）到康德（I. Kant）的哲學史研究，甚至有一篇文章批評亞理士多德的自然科學研究缺乏經驗根據。對於哲學，高野長英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字眼，他用的字是「學師」，文中意謂「普遍而最重要的學問」（general and the most important learning）。高野長英被認為是日本西洋哲學的先驅，特別著名的是他開放日本心靈以接受西方學問大膽而前進的觀念，他提出的這些觀念我們可在他的許多書或文章中看到。

這樣的見解在當時是不希望有的，因此高野長英必須委屈藏躲以逃避警察。西元一八四〇年他終於被抓到了，並且判他終身監禁；西元一八四四年他又逃脫了，然而警察也再一度抓到他，他切腹自殺，以免為密探的劍所殺<sup>③</sup>。

為滿足對歷史的考據癖，我可以指出現存在日本最古老的哲學書是 Lewes 的《傳記哲學史》（*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及康德的《人類學》（*Anthropologie*），後者是德國商人 C. E. Boedinghaus 携入日本的；毫無疑問的，他是假裝荷蘭人而進入日本的，他並曾會見過西周<sup>④</sup>。

### 兩位先驅：津田真道和西周

西周的事業，就像津田真道和許多明治維新時代的領導性知識分子，清楚的指出他是接受西方知識的先鋒。而這些人的出身通常是武

③ 桑木嚴翼：《明治の哲學界》，中央公論社，1943，頁 10-12。

④ 麻生義輝：《近世日本哲學史》，近藤書店，頁 124-27。

士家族或醫生家庭。他們接受過中國古典的教育，並且前往長崎或江戶（東京舊名）學習蘭學，然後被送出國留學；而在他們返國時，新政府便給他們一個職務，及至他們退休時，政治上便封賜他們為貴族。

西周生於岩見（島根縣）津和野族的城內，他的父親是個醫生。津田真道生於岡山，是武士之後。他們兩人都前往江戶學習，西周在西元一八四七年抵達；津田真道則在西元一八五二年。在他們完成學業後，都被派任到「蕃書調所」，在那裏，這兩人拓展他們對哲學問題的興趣，甚至西周還做了一些這方面的講演；然而，哲學仍得不到主持這個西方研究中心的主管高度的肯認。

西元一八六二年六月，西周、津田真道和其他五人被送到國外研究。這羣人主要是由海軍候補軍官組成，而由未來的榎木武揚將軍率領，其中只有西周和津田真道是學習法律和政治科學的，他們從品川出發（品川是現在東京港的一部分港區），在長崎做短暫的停留後，經過一年終於抵達鹿特丹（Rotterdam）。西周和津田真道前往到萊登（Leyden），在那裏，他們加強荷蘭文，並選維瑟林（S. Vissering）的經濟學、法律和政治科學及歐普從謀（C. W. Opzoomer）的哲學課。津田真道改編維瑟林的講義，而在西元一八六八年出版《泰西國法論》這一本書；同年西周翻譯維瑟林的《萬國公法》講義成日文，當時正是西周返回日本而被任命講授這門課。西周還翻譯了耶林（R. Jhering）的 *Der Kampf ums Recht*（《為權利而奮鬥》），並寫了一篇討論公法的〈公法手錄〉當為導論，而在西元一八八二年出版。

津田真道還翻譯了維瑟林的統計學《表記提綱》，這種知識在日本語文中還是第一次出現的。另外哲學也得到關心，當時在萊登十分熱門的哲學是孔德（Comte）的實證主義和彌爾（J. S. Mill）的經驗

主義。根據津田真道的說明，西周是傾向唯心哲學，而他自己則是較傾向實證主義，然非唯物論者。

西周和津田真道在西元一八六五年十月離開萊登到巴黎，在那裏，他們碰到了也是明治時代早期的著名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森有禮，從馬賽 (Marseille) 出發，經由亞歷山大城 (Alexandria) 和蘇彝士運河 (Suez)，這羣人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返抵日本。

在西周攜回的書中，很多是孔德和彌爾的著作，古仙 (Cousin)、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和黑格爾 (Hegel) 的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精神現象學》) 也包括在內，另外有很多書是關於海軍和陸軍，根據這些資料，使西周得能編成軍事字典；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如狄更斯的《雙城記》等讀物及維爾納 (J. Verne) 的著作，維爾納的著作在明治中期曾廣泛的被日本有科學心態的人閱讀。

他們回來後，這兩個人被任命到開成所，開成所是從蕃書調所演變而來的，最後開成所又演變成東京大學。而當日本人旅居海外時，他們發現英文、法文、德文比荷蘭文更爲有用，因此荷蘭文不再被視爲是西學的語文。西周甚至在西元一八六七年左右教後來的將軍慶喜法文。當時西周是在京都，他是在西元一八六六年八月離開江戶，正要跟隨將軍前往到大阪。這時，德川將軍的幕府統治已快結束了，於是西周向日本真正統治者提出兩個改革方案：第一個計劃是保留將軍的權力和特權，而以將軍爲上議院領袖，有權否決下議院；第二個方案較爲實際，然而還是不爲當權者所採。他被勸靜靜的退休，去開發北海道這個荒蕪的地區，以便讓十六歲大的天皇及其大臣有自由機會處理日本大事。

最後，事情決定了，但不是他的方案；對於此，他雖然是屬於失敗的將軍一系，但並沒有即此終止他的事業。西元一八六八年十一月

他被派任負責沼津兵學校，並在一年後被任命為東京的兵部省大臣，他也在育英社任教，並在西元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年間完成他大部分的哲學作品，他的手稿顯示，在西元一八七一年後約有一年，他向明治天皇進講西方歷史和哲學。

西周和津田真道後來加入森有禮創立的「明六社」，明六社的其他成員有神田孝平、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樹和福澤諭吉。在「文明開化」口號下，這羣啟蒙主義者領導着散播西方進步的思想和風俗到整個日本。

西周和津田真道兩人都在明六社機關口舌——《明六雜誌》寫了很多很重要的文章。當時最大的爭論是在於知識分子是否應參加政府才算是參政；明六社除了福澤諭吉外幾乎都採取一致的看法，福澤諭吉維持着一種疏離的關係，以保持他的獨立，因此他並不是實在委身於保守或獨裁的潮流中。

津田真道受任為靜岡的警察總監，後來升任為法官，因此能夠參與法律的制定，後來再任為外務部大臣，與伊達宗城為全權特使來到中國。西元一八九〇年他成為東京學術院的會員和下議院主席，同年他也被任命為上議院議員並受封為男爵。

在另一方面，西周主要是在教育界工作，設計新課程，西元一八七九年他被選為東京學術院主席，並連任達七次之多；西周也曾在西元一八九〇年進入上議院；像津田真道一樣，他也有爵銜，並在死後追封為男爵。西周很有幸得森鷗外為他作傳，森鷗外的職業是醫生，但他則以小說家出名，他跟西周有姻親關係，並且是在同一地方津和野出生<sup>5</sup>。

<sup>5</sup> 森鷗外：〈西周傳〉，《森鷗外全集》卷九，頁 3-110，岩波書店，1937。又見 R. F. Hackett, Nishi Amane, A Tokugawa-Meiji

對於津田真道的哲學討論偏少，這是因為他在這方面的著作不多；然無論如何，他拓展了早期的哲學興趣，很清楚的，如同西周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它將是永垂不朽；西周曾多次而皆無法推翻津田真道的自然主義和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在津田真道於西元一八六八年所寫的一篇短文〈性理論〉中表現得最明白。另一篇文章〈唯物論〉則刊載於西元一八九二年的《東京學術院院刊》。

在萊登時，津田真道自己宣稱為實證主義者，而西周則熱衷於康德；然而事實上，西周並不是喜歡康德的知識批判學，而是欣賞康德的 *On Eternal Peace*（《論永久和平》）。津田真道早期的「天氣」說——無限制而又任意滲入所有事物的元素，是在接觸了流行於當時的法國百科全書派、唯物論及實證主義者的思想，而後才逐漸形成的科學、實證態度。不過雖然是如此，津田真道還是以法學專家，比當為哲學家或思想家為稱職；桑木嚴翼曾提供津田真道許多法學譯名，如 *Civil Law* 譯為「民法」便是。

### 西周的哲學著作<sup>⑥</sup>

稱西周為日本西洋哲學之父，他實在是當之無愧。許多至今一直使用的日文哲學名詞翻譯，都應歸功於他，西周翻譯、改編並且開創出自己的原創著作，他的術語在西元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井上哲次郎曾加以潤飾、改進。井上曾編輯《哲學字彙》，這本書在西元一

(續)Bureaucrat 在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VIII, No. 2, Feb. 1959, pp. 213-250.

⑥ 桑木嚴翼：《明治の哲學界》，頁 91-115；永田廣志：《日本唯物論史》，白楊社，1949，頁 94-97。



九一二年曾重新再加以修改。

西周草創的努力，為他人澄清出一條不難遵循的道路來；事實上，最難的部分是在如何聯結表義的日本漢字與新奇的西方觀念，以形成一個新而正確的術語。

試舉一例，西元一八七四年西周以「哲學」翻譯 Philosophy，這個字是「希哲學」的簡寫，「希哲學」則是「希求哲智」的簡寫，這是根據希臘字源意為追求智慧或愛智之學。而在西周的手稿中，他搖擺於使用「窮理學」（自然哲學）、或是「理學」（「理」字今天已用到自然科學上）、抑或是「性理學」（自然事物之科學，今天已用為生理學（Physiology））；後來他明白了，西方 Philosophy 一字也指心靈哲學，即也指哲學心理學和道德哲學，於是西周放棄上述諸名詞，而專取「哲學」一詞；也因此，這個詞成了 Philosophy 的標準譯名，這件事當然部分也是由於他在教育上的地位的關係<sup>⑦</sup>。

事實上，西周如同其他許多明治時代的西學先驅者，都有一些中國學問基礎。但是這一些都只是在解釋西方資料；在中國，術語即使有，也是很少數，西周在《百一新論》中解釋「哲學」說：中國思想的架構比中國文字更具特徵；西周指出哲學無非是澄清天道人道的工具（message），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儒家的見解，而非完全是西方式的；然而西周的《百學連環》含有極豐富哲學術語的分析。

即使西周的作品有付印的日期，我們還是很難肯定他許多文章究竟是寫在何時。也就是，注明的日期與實際寫作的日期是不一樣的，

⑦ 見麻生義輝：《近世日本哲學史》，頁 315-16 論日本哲學術語演進部分，「希哲」一詞來自「希賢」或「士希賢」，而「希賢」或「士希賢」則是周濂溪《太極圖說》中語，見數江教一、相良享：《日本の倫理》，歐文館，1959，頁 144 又頁 255 的腳注十。